



•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
ZHONGSHAN DAXUE RENLEIXUE WENKU



多元与共融

——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周大鸣◎著

DUOYUAN YU GONGRONG
—— ZUQUNYANJIU DE LILUN YU
SHIJIA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多元与共融

——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周大鸣 著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周大鸣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8602 - 8

I . ①多… II . ①周… III . ①民族人类学—研究
IV . ①C91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9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多元与共融
——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周大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602 - 8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2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序言 多元与互动——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1

第一编 总 论

族群与文化论——都市人类学研究.....	9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23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冲突及其消解方式	55
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	66

第二编 华南族群关系研究个案

当代岭南文化与族群:新的综合.....	87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略论	98
略论潮汕人的文化与潮汕人.....	115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	125
澳门的族群.....	138
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的调适与族群认同.....	157
澳门的文化多元与和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	178
从“客家”到“畲族”.....	190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 比较研究.....	202

第三编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族群关系个案研究

略论夏河族群与族群关系.....	223
河湟地区族群互动关系的文化解读.....	246
多重证据法与族源研究——以中国西南族群生物遗传多样性与 区域文化研究为例.....	265
族群遗传基因与族源研究——云南独龙族文化和 HLA-DRB1 基因多态性综合研究.....	277
族群孤岛与族群边界的维持.....	288
后记.....	319

序 言

多元与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是族群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族群认同属于族群心理研究范畴，建立在族群意识的基础之上；族群关系则是属于关系研究，以族群主体之间的互动与交往形态为研究对象。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不同群体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而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而多元的当今世界。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下，族群成员的认同与变迁以及族群之间的关系不但深刻影响着族群意识，而且使得族群的内涵和边界呈现出多元与互动的时代特征。

多元认同：“民族国家”下的族群意识

“族群”一词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使用，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① 人类学语境中的“认同”(Identity)则已经超出原本属于的哲学

* 本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关于“民族”和“族群”两个词的论辩在国内人类学界持续已久，并产生了多种界定和使用的观点。其论辩的本质是西方舶来词汇 nation/nationality 与 ethnic groups/ethnicity 在中国情境的本土化过程中的词汇对接问题。本文重点不在于再次对两个概念的区分，笔者的观点是用“民族(Minzu)”表示我国法定的 56 个民族，而“族群”作为一个学术词汇，可以涵盖民族和次级群体，如藏族中的康巴、安多人，汉族中的客家、广府人等。

① Tomas Barfield(ed.),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2 多元与共融

范畴和心理学对于个体研究之应用,转为着重揭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归属认知,从而成为解读当今民族政治紧张和压力的矛盾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族群认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根基论(Primordialists)(又译为原生论)和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ts)。笔者认为,对于认同基础的族群情感和工具因素的二元分类不利于全面理解族群认同,只有在具体场合中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才能更好地把握族群认同的真实情况。

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在与周围其他人交往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以个体为中心的从内而外推出去的、由深到浅的关系格局。人生活在不同层次的群体之中而实现社会结合,这些群体包括血缘群体(如宗族)、地缘群体(如社区)、政治群体(如国家)、文化群体(如方言、信仰)等等。族群认同作为群体认同的一种类型,也相应地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只要需要,任何族群特征都会形成不同的认同形式:情感归属、社会分层、政治组织、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认同形式的多样性加上族群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建立的,共同促成了族群认同层次的产生。某一特定族群的成员,根据其所生存的族内和族际环境,会在不同层次上选择认同,这种层次反映的是感情的亲疏和归属感。如我们对澳门族群的研究发现,其认同层次次序为:中国人、澳门人、广东人、香港人、南方人、客家人、潮州人、葡萄牙人。^① 顾定国对族群认同的层次性研究认为,认同的最基础是阶级、亲属关系、村落,接着是本地(镇、县、市)、方言社区、省或区域,最高层次是什么人(people),然后是社会的或民族的大区域(如西南、西北)。^②

族群认同不但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性的特点,而且不乏多重认同的例子,如海外华人的认同,既有所谓对祖国的历史认同与对中国的民

① 周大鸣:《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② G. E. Guldin, *The Waishengren Are Coming: Ethnicity and Migration in Guangdong*, AAS 1995, Washington, D. C.

族主义的认同，又有社区认同与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此外，还有所谓的文化认同与种族认同等等。^① 另外，应当以动态的眼光来理解族群认同，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族群与特定地域的联系不断松弛，伴随移民与在地化过程的是族群认同的主观意识的不同程度的传承或变迁。比如在都市化进程中，携带其文化传统来到新的生活空间的新移民可能保持其认同和生活方式而出现“浙江村”、“河南村”等群体聚居区。而笔者在粤东地区潮客村落调查发现的客家族群潮汕化和潮汕族群客家化个案则生动地展示了族群认同变迁的历程。^②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发祥于近代欧洲的国家建构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理解文化意义上的族群认同不能忽视政治因素对认同的影响，事实上，伴随着国家统治技术的实践，族群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型塑已经糅合在一起。族群意识的重塑和国家认同出现同构的特点。如美国试图通过国家主义将多元族群整合为美利坚民族共同体，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也是通过对国家不同的想象形成了国家认同。^③ 我国在革命时期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独立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以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代表，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成了当代中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成功实践案例。

关系互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

^① 周星：《多重认同：从海外华人谈起》，载《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周大鸣：《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③ 陈志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只有将族群置于互动的结构与网络之中，才能动态地把握族群边界和族群关系。族群的认同必须在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去探讨，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群体中，是不会产生族群认同的，至少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认同和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局面。^① 其中，美国学者在对本土族群（包括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以及白人族群）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以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② 戈登提出从七个方面来研究族群关系：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与权力冲突。^③ 在这个意义上，族群认同化为与其他六个因素同等地位的变量。笔者认为，其他六个因素最终都会以认同的形式表达关系。

当我们把族群关系与互动置于这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中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学界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如关于族群认同在全球化时代的变迁，就有学者提出世界主义^④、超民族认同和回归传统族群认同等认同方式。^⑤ 哈贝马斯曾断言，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变动的图景，它会不断挑战“民族”的边界，直到最终摧毁民族大厦。^⑥ 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公民认同对族群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整合，提出“后民族结构”的概念。认为伴随着资本、人力、社会组织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族群乃至民族国

^① 周大鸣：《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② 周大鸣主编：《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前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③ M.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 Jeremy Waldron, “Minority Cultures and the Cosmopolitan Alternative”, in Will Kymlicka (ed.), *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 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

^⑥ 尤尔根·哈贝哈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家都在国际社会交往主体多元化的影响下,出现了角色淡化和边界模糊的趋势。格罗斯更是用“公民国家”(Civil Society)^①的概念试图整合全球化时代的族群与国家关系。马戎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情况,认为中国是建立在公民权制度基础上的多族群的“公民国家”。^②

我们应当看到,民族国家仍然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分析框架。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现代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消失,许多族群自我意识不断强化,是当今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真实的另一面。相反地,全球化的到来并没有直接导致族群融合和一体化,反而让很多族群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更加强调自己民族的特质、边界和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民族的意识、认同都在加强,即对自我族群文化中独特的特质产生强烈的意识。所以全球化的过程不是族群融合和一体化的过程,恰恰很多时候两者是背道而驰的。在族群自觉和族群意识加强的过程中,怎样去构建族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些跨国境族群会在族群认同的整合作用下超越对国家的认同,使族群关系复杂化。如中国境内的一些维吾尔族在泛突厥主义的煽动之下与境外势力结合,给主权国家的完整性带来冲击,也导致了族群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事件的发生等。同时,全球化也为族群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各种通讯技术和交流手段,这样使得族群关系的复杂化进一步加剧。

此外,族群关系的互动形式也是多元化的,很多地区的族群关系仍以和谐为主流。笔者就曾在对澳门的多元族群和文化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澳门多元族群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得当地族群关系趋于融洽,突破了亨廷顿所认为造成文明差异和冲突的种种因素。^③

^① 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与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周大鸣:《澳门的文化多元与和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第 3 期。

结语

本文集名为《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多元与共融”可以说是笔者多年来研究族群与族群关系所形成的理念。正如1990年在中根千枝和乔健先生为费孝通先生80华诞贺寿而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东京)上，费先生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主题演讲中曾针对族群关系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期待。^①这段话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启发和激励作用。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日益多元和互动，为人类提出了和谐共处的更高要求。作为后辈的人类学者，我们应当继续沿着前人的研究积累，进一步为“多元一体”的和谐中国和“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的构建而不懈努力。

^①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读书》1990年第10期。

第一编

总 论

族群与文化论

——都市人类学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族群一直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都市中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

有关族群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并常与一些名词混淆。笔者选择如下定义: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① 总之,族群的划分主要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族群与文化。

一、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基础

族群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渊源上的。自城市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或者不同部落,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以后,城市由于多族群的存在而具有普遍的跨文化的特征。这些群体组织经常强调共同的继嗣和血缘,

* 作为都市人类学研究系列之一,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都市人类学研究系列的《城市文化职能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中)》、《未来的城市与都市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研究(下)》分别发表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4期。

①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这样由于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而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经常，社会科学家们认为这是群体中个人认同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身份。同时文化渊源又是重要的族群边界和维持族群边界的要素。

都市人类学涉及族群时的困难之一，就是族群经常被视为文化和结构的现象——这两者经常是难以区分的。从文化看，一个族群被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的文化传统（食、衣、语言、家庭组织、价值观）群体，形成在特定的地方，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因为城市是依赖外来者集合而成，这些外来者曾受不同传统的濡化。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城市绝大部分居民是移民，这种城市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但这种特性并不一定会成为族群组织的基础。

从族群性的结构方面看，群体构成的基础是共同继承的传统。在都市聚落中，文化特质的实际共性可能没什么意义，共同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可能与共同学习传统无多大关系。

族群的创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都市聚落和特别族群之间的多元关系。在移民过程中同村的成员、扩展的亲属群体、方言群体，如果可能会聚居在一起，至少他们之间会经常来往。当一个具有共同文化渊源的特定群体被城市中其他群体认识的时候，他们将被其他人认为是具有共同文化物质基础的群体。这是从他人之角度来看，这经常与群体间的歧视、群体间的竞争或者组织志愿团体相关——甚至可能丧失了共同的文化特质，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然会成为自身组织和凝聚的基础。有关族群与政治组织关系的研究表明，当这些群体卷入政治行动时，他们能经常动员起成员的资源，换一个时间，群体会运用共同认同来发展接受或控制特定的经济职位。

我们可以从美洲—美国人族群的符号看到这一过程，这一群体包含了非常大规模的不同的人口，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符号联合成一个团体，这包括创造一面旗帜，用一种语言（一种非洲语）、一种发式（在传统非洲是主要的）、服饰（以西非为主）和食物模式（依据美国南部的历史条件）。

笔者对澳门的研究表明,澳门各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原文化联系相当紧密。澳门在地理上与广东连在一起,其居民也大多来自广东或其祖籍在广东,因而与广东各方面的联系相当密切。历史上,广东的居民多次把澳门作为避难地。历史上澳门人口的几次大的波动,如1879—1924年,由于内地社会动荡,澳门人口激增;抗日战争时期,澳门人口从1938年14万人增加至1940年的40万人。在经济上,两地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几乎在同时腾飞,正是两地经济联系加强的一个表现。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人在澳门开设窗口,另一方面是澳门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在血缘上,澳门95%以上的居民祖籍在中国,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现在许多家庭仍分居两地,在珠江三角洲部分家庭有澳门亲属,一些家庭是丈夫或妻子在澳门,周末才回家。^①两地人来往也相当频繁:珠江三角洲人去过澳门旅游的很多,也有不少企业家、商人经常往返两地;澳门人很少有没来过广东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尤其是清明节都要返回家乡。从社团的交往看,两地社团的交往密切,如同乡会之类的民间社团不仅交往的频率高,而且交往的范围广,从娱乐活动到经济活动都有,除此之外,两地通过传播媒介的交往也很频繁,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报纸等,尤其是电视和报纸是两地文化互相传递的重要工具。

二、都市文化对族群性的影响

都市中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文化的异质性。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城市中族群的认同明显是异质性的,这既是都市复杂性的反映,亦造成了都市的复杂性。

格卢克曼(Gluckman)指出在非洲对都市的首要反映是部落性而

^① 孙九霞、周大鸣:《浅析澳门与广东的文化关系——以对斗门县乾雾镇的初步调查为例》,《广州社会》1996年第1期。

不是偏远地区的部落生活特征。在偏远地区，人们住在一个同质性的部落聚落中，他们认同为特定部落群体的成员不多，这种群体的构成是依据亲属制、政治和其他因素。相比之下，在都市，人们生活在有许多部落群体文化多元的聚落，部落的认同更为复杂。^①

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世界上非都市地区族群是有规律地交往的。事实上，巴斯(Barth)就曾经作过非都市区的族群性研究，他们经过长期的交往，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但通常都不会多过两到三个群体。而在都市地区，群体的成员多且相关的规模也改变了。由于都市人口的流动性大，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因而都市族群是不同的。^②

布瑞曼(Berreman)研究了印度一个族群，也提出他们自身和他人认同的社会分类方式方法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单位运用并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依据了族群的区域、国家、语言、宗教的分类。^③

部落群体中的结构性差异(宗族政治因素)，一些在都市环境中消失，一些则得以加强。如布鲁纳(Bruner)对印尼一个社区的研究，在那里不同的村、继嗣群体和部落的成员间形成认同，从而消解了我们和他们(陌生人)的区别。^④

三、族群性作为一种文化的持续

大多数都市人类学家的出版物在论及民族性时都集中在来自文化

^① Max Gluckman,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Arrising from the Af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idan Southall(e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② Frederic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1.

^③ Gerald Berreman, "Social Categori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Ind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72, 74.

^④ Edward Bruner, "Urbaniz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North Sumatr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1961), 501—21.